红旗漫卷六盘山

■章熙建

山河赋

91年前的金秋，六盘山层林尽染，满目金黄。一支衣衫褴褛的红军队伍艰难行进在崎岖山道上。突然，一个豪迈的声音在山口响起——“同志们，屈指行程已二万！同志们，屈指行程已二万！六盘山呀山高峰，赤旗漫卷西风……”

时过一年，又有两支红军队伍相继翻越六盘山。他们坚定铿锵的脚步，仿佛伴着那久久回荡在崇山峻岭间的《长征谣》，走向会师，迈向胜利。

追寻这金石之声般的回响，我走进红旗漫卷的六盘山。



宁夏固原市的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（无人机照片）。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

一

“峰高华岳三千丈，险据秦关百二重。”

巍峨六盘山，森林茂密，山势险峻。山脉横贯陕西、甘肃、宁夏3个省区，南北绵延约240公里，主峰米缸山海拔2900余米。六盘山既是陕北黄土高原和陇西黄土高原的界山，也是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，自古就有“关中屏障，丝路咽喉”的美誉。

先秦至元代前，六盘山称作陇山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古代设有翻越陇山的“略畔道”。元代后，此地始称“六盘山”，系由山路曲折、六重盘旋方达山巅而得名。

这里曾是文化交融的枢纽地带。新石器时代，仰韶、马家窑、齐家文化在此接续传播；先秦时期，周人西扩与西戎诸部交融；秦汉时期，此地纳入大一统礼仪体系，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在此深度融合。

这里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。自周秦到汉唐直至明代，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前，关陇古道就是中原连接欧亚大陆的纽带。至今残存的古代古地遗痕上，2000余年间的驼铃声，仿佛还在回响。

这里曾是中原腹地的军事战略屏障。六盘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前秦、汉、明代曾相继在此修筑长城。三川口之战、好水川之战等著名战役在这里发生，留下“五里一燧、十里一墩、三十里一堡、百里一寨”的边塞奇观。

历史的辉煌，定格于1935年的秋天：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，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——六盘山。10月19日，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，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毛泽东同志在六盘山顶吟唱的《长征谣》，后经他多次打磨，成为气壮山河的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：“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二万。六盘山上高峰，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”

二

“会宁、会宁，红军会师，中国安宁。”

1936年9月下旬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陕北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点时，周恩来提议放在会宁。毛泽东当即赞同了这个提议。会宁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西北偏远小城，从此进入中国革命史册。

会宁县，位于甘肃省中部，南依六盘山，北临黄河，东南紧靠西兰公路，山地、沟壑与旱塬交错，是陇中军事战略要地，也是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北上必经之地。同时，这个地区民风朴实，有利于红军集中休整，补充给养。

回望红军三大方面军会师历程，其实并不是自然而然地“水到渠成”，而是在山河阻隔、敌情变化等错综复杂情况下展开的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战略集结。

1936年5月，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，蒋介石调集16个师又3个旅兵力，对我西北根据地发动新的“进剿”。为粉碎国民党军的“进剿”，巩固和扩大西北苏区，中共中央、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西方野战军，发起西征战役。西方野战军征战2个多月，击溃敌马鸿逵、马鸿宾部主力，粉碎了蒋介石“进剿”，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，并与陕甘根据地连成一片。

红军西征期间，1936年7月2日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到达川西北的甘孜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联名致电：“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，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，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。”随后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。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，向着陕甘苏区前进。

8月下旬，为接应尚在甘南的红二、红四方面军，红一方面军主力奉命挺进西兰公路沿线。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八月底，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预旺堡、同心城、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，以策应二、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。”

9月15日，一份电报从陕北飞向甘南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彭德怀致电朱德、张国焘、陈昌浩：“……四方面军宜在五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、静宁、会宁、定西大道，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。”

随着三大主力会师的前景一步步清晰，1936年9月21日，中央组成以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等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，指挥三个方面军。9月30日，彭德怀下达了红一方面军南下的部署，抢占静宁、会宁一带交通要道，并于10月2日一举攻占会宁县城，为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创造了条件。

至此，经过周密筹划和不懈推进，红军会师战略布局终于形成。

三

“红旗飘，军号响。战马吼，歌声亮。铁流两万五千里，红军威名天下扬。各路劲旅大会师，日寇胆破蒋魂丧。军也乐来民也乐，万水千山齐歌唱。”

时任红2师政治委员的萧华，后来在《长征组歌》的歌词中，生动地再现了红军会师的雄壮喜庆场景。

1936年10月，秋高气爽，会宁城红旗飘扬。10月9日，经过艰难曲折的跋涉，红四方面军主力终于抵达会宁。

会宁城内红旗招展，百姓们自发端茶送水、奔走相迎，热情款待风尘仆仆的红四方面军官兵。久别重逢的两个方面军战友，眼含泪水，抛下身上的背包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时任红一方面军第1师师长陈赓见到一身破烂皮袄、满脸胡须的朱德总司令时，心中一阵酸痛。敬礼之后，他喉咙哽咽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朱德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一份90年前的泛黄电报手稿，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看：“彭、陈、杨并报毛：二方面军一部及贺、任、关、刘于今日到达将台堡、硝河城，余部明日可到，左、聂22日24时。”

这是1936年10月22日深夜，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、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彭德怀等并报远在陕北的毛泽东：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、刘伯承已经抵达将台堡。

从10月9日到22日，近半月的时间里，隐藏着惊心动魄的凶险。

1936年9月上旬，按照中央部署，红二方面军制定了成（县）徽（县）两（当）康（县）等地的战役计划，配合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作战，并迟滞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，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。张国焘中途反对中央北上方针，坚持南下，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。红四方面军北上延误，协同计划落空，国民党军数路重兵合围，红二方面军孤军难以立足。10月初，经中央同意，红二方面军放弃成徽两康根据地，抢渡渭河，向已经会师的主力靠拢。

多年后，贺龙在回忆起抢渡渭河时，仍不胜唏嘘：“过渭河，狼狈极了，遭敌侧击，渭河上游下暴雨，徒涉，水越来越大，冲了点人去。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，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……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。”

渡过渭河后，红二方面军继续向北急进。10月22日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红二军团到达将台堡，与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2师胜利会师。10月23日，红六军团在距离将台堡约14公里的兴隆镇与红一军团第1师会师。

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第1师3团官兵与兴隆镇群众一起，张灯结彩，杀猪宰羊，张贴标语，扎起牌楼，准备迎接红二方面军。10月22日，时任红3团政治委员萧峰代表红一方面军，将3万块现洋、1000多套棉衣、50件皮大衣、540匹土布及数万斤粮食、2000多只羊、20多头牛、30多头猪、数万张羊皮等慰问物资送到将台堡，交给红二方面军。贺龙见到这批慰问物资，感慨地说，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

以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为标志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。全党全军空前团结，为奔赴新的斗争征程铺就道路。3万余红军官兵喜气洋洋，精神抖擞。周恩来形象地说：“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，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，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。”

四

将台堡镇，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，古时为军事要塞，战国秦长城在此向东转折，称为西瓦亭。1996年，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”落成。这一年，10月22日被确立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。

纪念广场上，风卷红旗猎猎作响。纪念碑被飘移的云朵衬托，犹如战舰破浪前行；碑顶3尊红军头像遥望北方，象征红军北上抗日、三军会师的壮举；碑座镶嵌的8组浮雕，生动再现从于都夜渡、遵义会议、强渡大渡河到翻越六盘山、三军大会师的历史场景。

红旗漫卷，山河开颜。长征的硝烟早已远去，新的长征路正在徐徐铺展。

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时，前有阻敌，后有追兵，红军无暇寻觅古代“略畔道”，而是用大刀劈出了通向胜利的陡峭荆棘路。90年过去，如今一条仿照当年荆棘路建成的“红军道”，在六盘山上逶迤延伸，前来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人们络绎不绝。六盘山下，一条高速公路隧道如长龙般穿山而过。从“翻越”到“穿越”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奋斗拓印在山川大地上。

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，途经兴隆镇。驻留养伤的南方籍红军战士见当地盛产马铃薯，乡亲们只会蒸煮食用，就用一支木漏勺、一锅沸水，把马铃薯制粉条的手艺传授给当地群众。乡亲们亲切地称之为“红军粉”。90余年过去，当年红军木漏勺漏下的那一缕粉条，已演变为一条条机械化流水线。兴隆镇王河村村民马正龙说：“我太爷爷从红军那里学会制粉，我是第4代传人，‘红军粉’给咱铺出了致富路。”

站在六盘山上极目远眺，青山云海绵延不绝。当年，红军将士用双脚走出了通向胜利的道路；今天，这条路上的足迹仍在延伸，红军不屈不挠、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在延续——向着更远的地方，向着更美好的明天。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 银

扫码观看视频走进
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

红色足迹

胜利山上话胜利

■向贤彪

“一道道的那个山哟，一道道水，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；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，一杆杆枪，咱们的队伍势力壮……”走进陕西省吴起镇，熟悉的歌声把我带回90余年前的那个秋天。

1935年10月19日，那是一个大晴天。杨成武在《忆长征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吴起镇披着灿烂的阳光在欢迎我们。”成仿吾也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欣喜：“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，像孩子一样，连跳带跑，直往吴起镇跑去。”

然而，胜利的喜悦还挂在红军官兵的眼角眉梢，一个棘手而紧迫的问题摆在了面前：国民党东北军的骑兵部队和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，已追至距吴起镇20里外的二道川口。

经过漫长跋涉和连续作战的红军，此时粮食和弹药严重匮乏。关键时刻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，坚定地说：“我们打退追敌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。”这一斩钉截铁的战斗决心，成为了红军的战斗动员令。

沿红军长征步道往上走，风从林间吹过，树叶簌簌作响。山顶，一棵苍劲的杜梨树枝叶繁茂。树下，有一尊毛泽东坐像。当年他就是在这里部署和指挥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——切尾巴战役。

站在山顶远眺，只见山峦层层叠叠，白云缭绕山间，民居点缀其中。当年并不是这般景象。美国记者斯诺初到陕北时，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作了这样的描述：“这在景色上造就了变化无穷的奇特、森严的景象——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，有的像成队的猛犸，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，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冈峦，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。那些奇形怪状、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景象，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。”当年，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山谷中设伏的。

10月20日，毛泽东在吴起镇西头打麦场上，与彭德怀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负责人研究敌情。会后，彭德怀连夜带人察看地形。吴起一带山高、沟深、路窄，正是攻打骑兵的天然战场。他命令3个纵队埋伏在吴起镇西南的头道川、二道川两侧山梁，形成对敌合围之势。

10月21日凌晨4时许，毛泽东在平台山顶的杜梨树下同第一纵队干部召开战前动员会，强调要打好长征最后一仗，给陕北人民送上一份见面礼。开完会，毛泽东靠在大树下休息，他已胸有成竹，告诉警卫员，枪打得激烈时不要叫他，打冷枪时再叫他。

上午7时左右，战斗全面打响。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骑兵4个团，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。事先埋伏好的红军官兵，突然发起猛烈攻击。一时间，火光冲天，杀声震耳，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齐发，编织成密集的火力网。敌骑兵在狭窄的深沟中无法展开队形，马匹受惊乱作一团，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。战斗进行到上午9时许，红军干净利落地击溃了敌军，取得了胜利。这一仗，红军击溃敌骑兵3个团，俘虏约700人，缴获战马1000匹及大量武器装备。

这场战斗，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战，也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。经此一战，彻底斩断了尾追之敌，稳固了长征的“落脚点”。为了纪念这场战斗，当地群众将战役指挥部所在地——平台山，改称“胜利山”。

胜利，一个多么崇高神圣、令人向往的字眼。长征路上，每一场战斗的胜利，每一处险境的突破，每一条通道的开辟，无一不是红军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有人曾问一名小红军：“苦不苦？”小红军回答：“苦是苦，可想着前面就是胜利，脚底板就发热。”质朴无华的话语，道出“胜利”在红军官兵心中的分量。

离开胜利山时，我回望那棵苍劲的杜梨树。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，守着那段红色历史，也望着我们继续前行。烽火已经远去，但那一道道山、一道道水，正等待后来者用脚步去丈量。

呼图壁纪事

■张 弛

我驻守的地方

我入伍时带的一本书，是贺敬之的《放歌集》。那是半个世纪前，新兵入伍时，我们坐的是一种没有座椅的“闷罐车”，席地而卧。从太原去新疆，一路西行，除了到兵站下车吃饭，沿途什么也看不到。整整5天时间，卧在车厢里，我只能读这本诗集，几乎快背下来了。印象最深的，是那篇《西去列车的窗口》：*在九曲黄河的上游／在西去列车的窗口／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／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……*

现在想起来，诗中的激情对我是有很大激励的。后来在乌鲁木齐后峡山谷3个月的新兵训练，又到部队农场近1年的繁重劳动，我常常想起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句子。

我的军旅第一年，是在一个叫“呼图壁”的地方度过的。呼图壁隶属新疆昌吉，地处天山北麓、准噶尔盆地南缘，戈壁、绿洲、河渠交错纵横。

我还记得通向农场的道路两旁，栽种着新疆特有的沙枣树、准噶尔柳。路旁有一口自流井，地下水从粗粗的井管里涌出来，一刻不停地流向庄稼地，哗哗作响。农场的场部，是七八栋土坯房围起来的两个院落，每个院子有两个篮球场大。在四周广阔的田野上，种植着水稻、麦子、苜蓿，还有一大片西瓜地。到了春天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盛开，黄灿灿的，漂亮极了。

呼图壁在蒙语中是“吉祥如意的地方”，但我当时并无顺遂之感。一个春风拂面的晚上，指导员侯建华找我谈心，我坦率地汇报思想：“谁知道来这儿当了个穿军装的农民。”指导员笑着说：“你们学生兵看看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，没什么坏处。其实，部队训练比农民还要苦，你能吃得了苦，才能当一个好兵。”

那一年，我在呼图壁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：盖房，挖渠，插秧，种瓜，割麦，扬场，脱谷……在这些活计中，插秧是最苦的，两腿弯曲似蹲马步，毒辣辣的太阳把头皮晒得发烫，挽起裤腿露出的后腿肚被晒得裂了口子，秧田里的碱水溅上去，生疼。我在心里默念着布袋和尚的诗，激励自己：“六根清净方成道，后退原来是向前。”水稻成熟了，还要脱壳。用脱壳机比较快，但是经常吹得灰尘满面，一天下来，即使我们都戴着口罩，吐出的痰也全是黑的。那时，我成天干这些脏活累活，却没有多少苦的感觉，每天铆着一股劲头，生怕落在人家后头。每天起床号一响，大家纷纷抢着去挑水、扫厕所、扫院子。我抢不过，便在饭后留到炊事班帮助洗锅碗。农活间隙，也有军事训练，主要是收放线，也就是野外电话线的收放训练。别人背一盘线跑，我尝试同时背两盘线，每次争取成为跑得最快的。

我在艰苦的生活中能够保持昂扬向上的情绪，是因为连队的风气好。连排干部和战士们吃在一起，干在一起。我们一个班，白天围着一个饭盆吃饭，晚上在一条通铺上挨着睡觉。那种朝夕相处的战友情谊，是终生难忘的。在家时，我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被褥，第一次缝被子，是老班长孟凡山手把手教我的。他是河北人，长得高大魁梧，很少说话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一排一班的兵，干什么都要争第一。割麦子时，他总跟我靠在一起，看我落下了，便顺手替我割两行。

农场劳动很苦，但有一个好处，是有时间看书。新疆天黑得晚，到晚上10点，太阳还挂在天边。每天夕阳西下，坐在营区外的土堆上读书看报，是我最惬意的时光。我和《解放军报》的缘分也是从这时开始的。每天的报纸，我会从头看到尾，抄录、背诵感兴趣的片段。这种方法训练了我的文字感觉。后来，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从事新闻报道。

呼图壁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一站。这个在内地鲜为人知的边陲小镇，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它是我精神的故乡。我的意志和毅力，都是在呼图壁锤炼的。我很想有一天再回呼图壁去看看，那口自流井的水还在哗哗地流吗？当年栽种的树苗一定长成参天大树了。